

王珏：“劳者有其股”为共同富裕立言



王珏现已从中央党校退休。他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以及经济学的研究和中国经济的探索。以他为代表的宏观改革优先理论，以及他提出的“劳者有其股”的理论，一经提出就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探索，使他成为在我国颇有建树和影响广泛的老一代经济学家。王珏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前半生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后半生则是为共同富裕而耕耘。

○ 邓聿文

与我国老一代中的很多经济学家一样，王珏也有一个外号，叫“王私有”。意思是王珏主张“私有化”，但其实这是一个误会。王珏并非主张“私有化”，而是主张“非国有化”。只要稍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非国有化”并不等于“私有化”。然而，与我国老一代的其他经济学家不一样的是，王珏有着传奇般的经历，他是亲自上过战场，带着武工队打过游击的经济学家，这可能在中国经济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有建树和影响的红色经济学家

王珏原名邹绍臣，1926年5月4日出生于辽海之滨的辽宁省辽中县的一个小村庄。少年时代的王珏，曾在辽中县国民高等学校就读，因不满日本人实施的奴化教育，王珏有一次领头发动同学罢课而被学校定了一个“反满抗日”的罪名。从学校毕业后，王珏组建了辽中县青年同盟会，并被推举为干事，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以后，王珏在辽南地区的辽阳、海城、鞍山等地打过游击，并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宣传部长等职。也在这个时候，因考虑到家人的安全，他把名字改为王珏。

1950年8月，王珏考入中央马列学院即后来的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于1954年1月提前毕业留校任教。自此以后，除了文革的几年外，王珏再也没离开过中共中央党校，直到退休。他先后担任过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所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会长，并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可以说，王珏把自己的大半生奉献给了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以及经济学的研究和中国经济的探索。

早在青年同盟会时期，王珏就受到了经济学启蒙。在考入中央马列学院后，王珏选学了他喜爱的经济学。当时，恰好《资本论》的翻译者郭大力先生正在马列学院任教，是马列学院的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王珏就跟随郭大力学习，后来又跟随在马列学院授课的前苏联老教师学习社会主义

经济学。

在王珏五十年的教学和研究中，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上，并在市场经济、生产力经济、乡镇经济、区域经济、股份制经济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

王珏已出版和发表的著作约1300万字。其中，90万字的《资本论解读本》是他文革时期写成的。从1954年留校任教到1964年受到无端批判，王珏用了十年精力，精心研读《资本论》，写出了90万字的《资本论解读本》，作为教材在校内印发学员，成为国内最初解读《资本论》的教材。文革结束后，王珏把《资本论解读本》加以整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重读资本论》。

其他代表性著作还有《简明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四十年》、《王珏经济文选》、《王珏选集》、《劳动力资本论》、《劳者有其股——所有制改革与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现代化公有制——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讨》、《改革攻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丛书》、《迈向新世纪的中国改革》等。

其中，《简明政治经济学》获通俗读物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四十年》获优秀出版物奖、《论现代化公有制》获12届国家图书奖、《中国的繁荣需要现代企业制度》获国家级优秀论文奖、《经济体制改革规划纲要（1988-1995）》获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等。

作为我国颇有建树和影响的经济学家，王珏在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很多理论观点一经提出，便引起了经济学界和中央高层的关注。他较早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进行反思，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观点。在改革传统所有制基础理论方面，王珏提出应当把公有制的性质和具体实现形式区别开来以及“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等重要观点。

王珏对公有制本身的性质和特征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现代公有制”和“劳动者个人股份所有制”理论。他还认为，保障和实现劳动者的

经济利益是社会主义经济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社会主义应使劳动力资本化，实现“劳者有其股”。

在国有经济改革方面。王珏首先提出了“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的宏观改革思路，并把建立“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微观上改革国有企业的总体方向。

王珏也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三阶段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将要经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初步结合、基本结合和完全结合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改革国有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和实现劳动者个人所有的现代公有制经济。

上述这些理论观点，用王珏自己的话来说，主要反映了三个基本问题：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劳者有其股、恢复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权。他认为，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根本的问题。

宏观改革优先和“劳者有其股”理论影响深远

对改革者和经济学家来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年代。思想的开放和对改革的憧憬使得学者们无所畏惧，纷纷提出自己的改革设想。在当时影响中国改革的诸多理论和流派中，以王珏为代表的宏观改革优先理论尤其引人注目。

该理论主要是针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选择什么样的战略，以什么为改革的突破口而提出的一种观点。它从中国实际运行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提出了宏观体制改革应当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主攻点。

宏观体制优先理论的根据是建立在“对企业改革主线论”和“价格改革主线论”的分析与批评的基础上，指出企业改革尽管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但并没有触动旧的宏观管理体制，企业要求“松绑”不可能实现，企业改革本身不能代替宏观体制改革，不能解决需求膨胀的矛盾，更不能绕开价格改革这一关，企业改革不能带动改革的全局。

王珏认为，价格改革主线论试图通过“抓中间（指价格改革）、带两头”的战略，但缺乏可行性，无法解决价格补偿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因此，必须推行以企业改革为基础的宏观体制改革先攻战略，即通过抓两头带中间的“牵牛鼻子”战略，才能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抓两头”是指抓企业改革这头，适应市场调节的企业主体就出来了；抓好宏观体制这一头，调节总量平衡和结构比例的宏观调控机制就出来了，在此基础上从价值和从使用价值上确保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大体平衡，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了，价格体制改革就是一个“放”字。可见，抓住了宏观体制改革，价格体制的改革就好比牵牛鼻子“那样顺手”。因此，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既不能把价格改革作为突破口，也不能把所有制改革作为突破口，而必须走“制衡总量，宏观先改”的路子。

上世纪90年代后，王珏进一步

提出了“劳者有其股”的理论，在学术界也引起了很大反响。王珏认为，国有企业真正到位的改革，应该是使“劳者有其股”，也就是劳动者应成为所有者、投资者。他说，劳动者股份所有制既不同于私有制，也不同于原始公有制和传统公有制。从价值形式看，财产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从使用价值看，则是社会化占有，是两者的统一。王珏认为，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权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股份制在由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确立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也就是说，不仅要使劳动者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和主要动力，确立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而且还必须保障广大劳动者占有和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股份制走向劳动者股份所有制，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实现结合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的基本路径是：改革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历经国有经济——民有股份制经济——劳动者股份经济三大主体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基础的过渡，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融为一体，即完全结合。

王珏认为，要做到“劳者有其股”，首先应从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入手，基于此，他赞成在改革中调整和量化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股份制企业改革应该推行“三一律”，即将三分之一的净资产量化给企业职工，作为补偿股补偿职工长期劳动所得，在补偿股基础上实行优惠股和投资股，这三种股占35%，使职工在身份置换中真正受益。剩余的65%，其中30%转为社保基金（落实到每个投保人），最后的35%可仍归国家所有，但应逐步集中到关键领域和关键行业的骨干企业中去。这样，不仅使国有资本（资产）集中到它应该存在和发展的领域，发挥其主导作用，从企业的资产结构上也实现了多元投资主体，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广大国有企业职工也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王珏的理论观点还有很多，有人曾把它总结成十点。如今，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已经82岁高龄了，但仍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

回顾自己的一生，王珏的评价是：前半生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后半生则是为共同富裕而耕耘。

■ 本期人物话语



暂缓成品油价格改革有利社会经济稳定

张国宝（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日前在出席中印日韩五国能源部长会议时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从计划到市场逐步过渡的石油及成品油价格政策，但当前正值国际石油价格出现飙升的时期，如果快速推进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必将对农业等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影响要远远大于油价上涨的影响。因此暂缓成品油价格改革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

■ 多声道

次贷危机对中国影响还没见底

李德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前局长）6月13日在中外跨国公司国际年会上表示，美国的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三方面巨大影响。第一，美国实行低利率政策，美元贬值政策导致金融市场动荡，使大量流动资金涌向商品市场，抬高了石油、粮食等商品价格，加大了中国的进口成本；第二，美国的消费疲软，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导致中国的出口受阻，同时也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第三，次贷危机使得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的资金链急速紧张，但同时国际市场上流动性严重过剩，出现了整体流动性过剩和局部流动性短缺并存的局面。从目前来看，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并没有见底，我们还应当保持相当警惕。

我国银团贷款实现跨越式发展

蒋定之（中国银监会副主席）日前在APLMA第十届亚太区银团贷款市场年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银团贷款市场逐步发育，制度建设日臻完善。近5年来，在中国银监会积极倡导、推动下和中国银行业协会的自律约束下，合作、发展、共赢的经营理念已在中国银行业得到广泛认同，银团贷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不仅体现在规模上的增长，更体现为“质”的发展。我国银团贷款的跨越式发展具体表现为：银团贷款制度框架逐步完善；银团贷款市场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银行业金融服务的提高，金融创新不断深化；银行业发展方式转变有所突破；银团贷款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

美国次贷危机最严重时期可能已过去

斯特芬斯-卡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6月13日在日本大阪准备参加八国集团财长会议时对媒体说，有理由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大半，但今年下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依然比较缓慢，而全球经济减速将对原油价格产生影响，有可能抑制油价飙升。并预测美国经济可能在2008年年底或2009年年初开始反弹，欧元区将紧随其后。美欧经济恢复的曲线将呈现“U”形，而非“V”形。

石油工业对全球需求增势估计不足

彼得·萨瑟兰（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6月11日在布鲁塞尔参加一个会议时称，石油工业对国际能源需求增势之猛估计不足，导致其没有在石油生产等领域进行必要投入，以缓解供应瓶颈。从个人观点来看，国际油价飙升至此如此高的水平，主要是由于石油工业的生产能力难以满足需求的上涨。这并不是由于资源匮乏，应归咎于石油企业对生产等领域的投入不足。另外，一些产油国政治局势不稳也使石油供应受到限制，从而推高了油价。估计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至少可以维持供应43至45年，另外一些重大油田的发现还有待被确认。

■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

张公权与中国银行业兴起

○ 梁捷

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兴起，有两个人居功至伟：一为上海银行创始人陈光甫，另一位就是张公权。他们的实践和思想，对中国银行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有一定影响。

张公权，名嘉璈，江苏宝山人，生于1889年。他的祖父是晚清县官，父亲张祖泽则是上海本地的著名中医，兄弟姐妹共12人，倒有一大半成为近代史上显赫人物。比如，他的二哥张君勱，与张东荪并称“二张”，晚年又成为新儒家代表。

张公权从小与张君勱一同读书，入上海方言馆习法文，后入宝山学堂。1904年考取秀才，翌年入北京高等工业学堂。他的导师中有袁观澜和唐文治这样的文学名家。1906年，张公权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导师是倾向自由主义的堀江归一和福田德三两位教授。可惜他后来家道中落，再付不起学费，于是1909年回国，在邮传部路政司谋了份工作，后又任北京《国民日报》、《交通官报》编辑、总编辑。后来，张公权曾积极从政。但经梁启超劝说，决定弃政从商，赴上海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年仅25岁。张公权从此正式步入银行业。

中国的银行业在20世纪初才刚刚起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民间钱庄，如著名的山西票号；一类是外资银行，著名的有英国的汇丰、美国的花旗、日本的三井和住友、法国的东方汇理等；还有一类就是真正的现代银行。1905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后又改称“大清银行”，这是我国最早的国家银行。1907年11月，邮传部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官商合办。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在清末最后几年里就起着中央银行的作用。

民国建立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正式作为中央银行开始运作。与此同时，民间的商业银行也开始兴起。由以前旧式银行改组的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等，以及新成立的天津盐业银行、上海殖边银行等，共同构成当时中国金融的主力。

张公权就在这个阶段进入中国银行，并很快崭露头角。他亲自修订中国银行则例，加强银行的独立性；又竭力抵制当时政府直轄中国银行的企图，以保证金融和国家财政的分开；他还注意团结同业，组织多家银行的经理一同参见“同业聚餐会”。这些都使得张公权成为当时金融界中越来越引人瞩目的新星。

可以说，1916年的“停兑禁提”风波才真正考验了作为银行家的张公权。当时，在梁士诒等人的献计下，当时政府决定“停兑禁提”，并于5月10日突然电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行，从即日起，对两行发行的一切纸币及应付存款都不得兑现或付现，并将所存现金一并封存。

一纸禁令顿时在群众中引起骚乱，银行门口排起挤兑的长龙。张公权毅然决定反抗这一禁令，以保证金融的独立性。一连三天，中国银行非但没有关门，反而延长了营业时间，来者不拒，一直等到挤兑人数渐少，直到当时政府发布取消停兑的决议为止。在这次风波里，张公权维护了中国银行的名声，也使得自己成为真正的银行家。

此后，张公权在1928年10月任中国银行总裁。1935年中国银行经第二次改组后，张公权被迫离开银行业，转任当时政府的铁道部长。他在中国银行总共工作23年，先后担任上海分行副经理、行副总裁、总经理等职。在这23年里，中国银行取得很大的发展，不仅在资本上大有扩张，也在制度上摆脱了政府控制和外国银行的挤压，成为真正独立且有竞争力的现代银行。

1938年，张公权转任交通部长，在西南铁路建设上颇有作为。但张公权最终还是对金融有兴趣，他在1943年辞职赴英国考察经济，1945年9月匆匆回国担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兼中长路理事长。

张公权在银行业实践中成为江浙财阀的主要代表人物，长期跻身于当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高层，是当时政府在财政和金融上非常倚重的一位人物，对中国经济问题也有比较深的观察。

张公权很早就意识到当时中国存在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1948年，张公权临危受命，担任中央银行总裁。此时，他想出几招，先是发行公债，以公债代替国库券来抑制通胀。但局势濒危，金融界和市民都不认可公债。为此，张公权又想出开放汇市，同样因为黑市猖獗而无功而返。最后，张公权求助于政治打压，但却使自己不得不离开中央银行总裁的位置。

张公权离开金融界后潜心治学。从1953年起，他接受美国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的教职，讲学七年，并写了好几本回顾和总结中国金融史的著作，在西方学界影响很大。他退休后又担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员。

1979年10月13日，张公权美国加利福尼亚逝世，终年91岁。据称，他晚年“对人心平气和，治事无怨无悔。故临终既无遗憾，亦无痛苦”。

■ 西窗听风

城市小广告：治理视觉污染药方何在

○ 梁雨霞

在中国，有一种现象被称为“城市牛皮癣”：居民楼的楼道里，大街上的灯柱和墙壁及公交站牌上，随处可见豆腐块大小的小广告。既然是“癣”，便是一种病态。是病就得治。然而，“城市牛皮癣”发作有年，但治疗方法却一直未有突破。无论是用水洗或用手揭，还是用铲子铲，这些“外科手术”都是治标而不治本。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不妨看看他乡的郎中是怎样用药的。

在德国，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超市。为了方便客人，很多超市设有免费的信息栏，供客人张贴供求信息，甚至准备了现成格式的纸片和笔。这种信息栏通常可见二手家具等器物、家教或陪护等服务信息。这种做法不仅保障了其他地方的整洁，也方便了公众。

如果把这种做法称之为“药”，那么，该药至少有这么几个特征：一是

想他人所想，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二是正确疏导，“牛皮癣”也能变成宝；三是做大买卖的人主动帮助做小买卖的人，非但与己无碍，还可彰显大者能容的气魄。成功的商人都是打算盘的专家，他们算得出，这样的善举，无须多少成本，却有着不错的社会效益，何乐而不为？

其实，不仅在超市，在其他的场所，如图书馆和学校食堂等人流量大的地方，也常能见到人们张贴的小广告。如今，网络的普及，使得人们多了一个方便的选择。有了这些信息集散地，人们当然不会把小广告贴得到处都是。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成本不等的其他平台，如报纸的分类广告、电视广告、信箱广告等，共同构筑了一个针对不同人群、包含各种产品、覆盖各种预算的立体的信息世界。当然，德国的做法有值得参考的方面，但也不能全盘效仿。

比如，德国的“信箱广告”泛滥成

灾。又如，德国也有自己的“城市牛皮癣”顽疾——“涂鸦”被一些人当作艺术欣赏，却被更多的人视为破坏公物而深恶痛绝。

遗憾的是，效颦的事情正在我国发生。一些人不积极扶持本土艺术，却大张旗鼓地搞什么“涂鸦一条街”。如此，原发的“城市牛皮癣”还未治好，又染上别人的毛病。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因为中国特色的“城市牛皮癣”而过多地指责国人的文明素质。当然，也不能因为国外也有“城市牛皮癣”，就放弃解决自己的问题，甚或盲目摹仿别人的“城市牛皮癣”。

既是“城市牛皮癣”，就属视觉污染一类。要从容地根治之，必须弄清污染源。须知，同患“城市牛皮癣”，中国的特色乃是求生存，而外国的特色却是为艺术。因此，我们希望，城市的管理者在解决此类问题的时候，能够充分考虑到这个因素。这样，我们的家园才会更和谐更美丽。